

耶稣会士利类思《狮子说》拉丁文底本新探*

□ 胡文婷

摘要:17世纪来华的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类思(Ludovico Buglio, 1606—1682)在做清宫“陪臣”时期,曾译著一本重要的动物学著作,名为《狮子说》,是西方动物学传入中国的代表著作。国内外学者虽对此展开了相关研究,但在底本问题上仍存有争议。笔者立足文本,通过文言文和拉丁文的具体对勘,进一步探究《狮子说》的文本来源,以补充明清时期东传的西方动物学的文献研究。

关键词:《狮子说》 西方动物学 利类思 拉丁文底本

中图分类号: K05 **doi:**10.19326/j.cnki.2095-9257.2018.04.009

利类思(Ludovico Buglio, 1606—1682),意大利耶稣会士,“系出阀阅子弟,自幼不事纷华,即入修道会”。^①利类思于1636年入华,其足迹由南向北,在华时间长达半个世纪。他在天主教传教史上常被称为“四川开教第一人”及“天主教本地化”的积极推动者。与大多数耶稣会士一样,利类思在进入中国前曾接受了系统的人文主义教育,在进入中国后,又发奋学习汉语,“读书穷理,博学精深”,^②成为彼时耶稣会士中的佼佼者。他一直致力于西学书籍的译述,内容涉及动物学、地理学、神哲学等,^③为推动西学东传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其中《狮子说》更是首次将西方动物学

带到了汉语知识语境,丰富了彼时中西文化交流的内容与层次。

一、《狮子说》创作背景

葡王阿丰索六世(Afonso VI, 1643—1683)曾在1667年派遣使团从果阿出发前往北京,希望清廷可以允许葡萄牙人在澳门自由贸易和航行,以减轻1662年“迁界令”对澳门葡人的影响。^④澳门方面也为此积极筹备出使的礼物清单,共计花费了白银30365两。^⑤但结果康熙帝仅是下旨“西洋地居极边,初次进贡,具见慕义之诚。

* 此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梵蒂冈藏明清天主教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号:14ZDB116)的阶段性成果。

① 南怀仁、闵明我、徐日升:《利先生行述》,载钟鸣旦、杜鼎克编《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12册,台北:利氏学社,2002年,第318页。

② 同上。

③ 由利类思创作、翻译的著作达二十余种,主要包括《物元实证》《弥撒经典》《司铎典要》《圣事礼典》《善终瘞莹礼典》《已往者日课经》《天主教约征》《圣教简要》《主教要旨》《安先生行述》《狮子说》《进呈鹰说》《御览西方要纪》《不得已辨》《超性学要》等。

④ 为了防范郑成功再次北上,并且扼杀其经济来源,清政府于1662年2月6日发布“迁界令”以求“坚壁清野”之效,命令山东到广东的沿海居民,内迁三十里,更严令禁止渔舟、商舟出海。见戴逸编:《简明清史》(第二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50页。

⑤ 据《海国四说》记载,撒玛尔达聂(Manuel de Saldanha)进呈给康熙的礼物有:葡王画像、金刚石、饰金剑、金铂书籍、珊瑚树、珊瑚珠、琥珀珠、伽南香、哆啰绒、象牙、犀角、乳香、苏合油、丁香、金银乳香、花露、花幔、花毡、大玻璃镜等。再加上往返费用及其他开支,澳门共计花费30365两。见张海鹏编:《中葡关系史资料集》(下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00页。

可从优赏赉”。^①显而易见,这并未达成葡国使团的预期目的。

时隔八年,葡萄牙使团再次来华,这次前来既是为了与尚之信划清界限,也是再次争取其在中国海域的贸易航海权益,葡王派遣本托·白垒拉(Bento Pereyra de Faria,生卒年不详)前往中国。这里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彼时阿丰索六世已被剥夺王位多时,但葡国听从了在京耶稣会士的劝告,即保守的清廷不会欢迎一个篡位者的使团,所以为了避免麻烦,他们仍假借了阿丰索六世的王名。^②同时,使团更是在利类思等人的建议下,为康熙帝带来了狮子以投其所好。

葡萄牙使团携狮子于康熙十七年(1678)抵达北京,这使得康熙帝产生了万邦来朝的喜悦,不仅多次带领皇子妃嫔观赏,还邀请重臣名士一起观看。高士奇在其《清吟堂集》中曾写道“赐观西洋进贡狮子恭纪,旧传仁兽游郊藪,今见驱虞出海邦”。^③另外,葡萄牙的这次贡狮活动还激发了许多文人共同的热情,据学者统计,共有九人作赋,四人作诗来描述这一盛况。^④利类思为了配合这次外交活动,也译述了《狮子说》,称“遐邦进活狮来京,从古中华罕见之兽,客多有问其像貌性情何如,岂能尽答,故略述其概”。^⑤而利类思如此支持葡萄牙的贡狮,不仅是为了争取和维护皇帝的友谊,更与他的耶稣会士身份密切相关。因为彼时在华的传教士均受葡萄牙保教权(Patronage)的庇护,其传教事业的经费主要由葡

国负责,而澳门作为葡萄牙的远东基地,之于传教士亦是远东的重要据点,如果葡萄牙人在澳门的贸易及航海顺利进行,那么天主教在华事业的发展也便有了相应的保障。

二、《狮子说》的底本来源辨析

利类思的《狮子说》首先是两页自序,在序后附有一黑白狮子像,随后是正文内容,^⑥分为“狮子形体”“狮子性情”“狮不忘恩”“狮体治病”“借狮箴傲”等章节,最后以“解惑”结尾。既为译著,那么利类思所依据的底本是什么呢?方豪在谈及最早译入汉文之西洋动物学书籍时,认为利类思的《进呈鹰论》与《狮子说》皆译自乌利塞·阿尔德罗望迪(Ulisse Aldrovandi, 1522—1605)的生物学著作。^⑦他的这一观点被意大利汉学家白佐良(Giuliano Bertuccioli, 1923—2001)沿袭了下来。白佐良在其文章《雄狮在北京:利类思和1678年葡国来华使团》^⑧(“A Lion in Peking: Ludovico Buglio and the Embassy to China of Bento Pereira de Faria in 1678”)中,不仅提到利类思的《狮子说》借鉴了阿尔德罗望迪的学说,还通过文本考证,进一步认为利类思创作期间借鉴的耶稣会图书馆的藏书应是大阿尔伯特(Albertus Magnus, 1200—1280)的《论动物26卷》(De Animalibus Libri XXVI)和阿尔德罗望迪的《论胎生四足动物三卷和论卵生四足动物二卷》

① 《中葡关系史资料集》(下卷),第700页。

② Lo-shu Fu, “The two Portuguese Embassies to China during the K’ang-hsi Period,” *T’oung Pao* 43(1955): 75-94.

③ 高士奇(1645—1704),浙江绍兴人,康熙帝近臣,官至詹事府詹事、礼部侍郎,著有《左传纪事本末》《清吟堂集》等。该诗出于《清吟堂集》第十卷,哈佛燕京图书馆扫描版,第386页,据“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数据库”<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128526&page=1&remap=gb>。

④ 参见侯立兵、郑云彩:《海外贡狮与明清应制诗赋》,《学术研究》2016年第7期。该文认为清康熙十七年西洋贡狮的文人诗赋分别为九赋四诗。赋:尤侗《西洋贡狮子赋》、徐嘉炎《大西洋国贡黄狮子赋》、毛际可《狮子赋并序》、侯七乘《狮子赋》、乔莱《狮子赋》、陈梦雷《西洋贡狮子赋》、江闾《狮子赋》、方象瑛《西域贡狮子赋》、王嗣槐《狮子赋》;诗:王士禛《大西洋贡狮子歌应制》、张英《西洋贡狮子歌》、施闰章《狮子诗拟应制二十四韵》、毛奇龄《诏观西洋国所进狮子,因获遍阅虎圈诸兽,敬制长句纪事和高阳相公》。

⑤ 张西平、任大援、马西尼编:《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丛刊》(第一辑),郑州:大象出版社,2014年,第35册,第159页。

⑥ 该《狮子说》版本为梵蒂冈图书馆馆藏本,编号为Borgia. Cinese. 350. 10,见《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丛刊》(第一辑),第35册,第159—175页。

⑦ 方豪:《中西交通史》(下),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第793页。

⑧ 此处著作中文译名为笔者简译,下文同。

(*De Quadrupedis Digitatis Viviparis Libri Tres et de Quadrupedis Digitatis Oviparis Libri Duo*)。^① 国内学者邹振环则提出不一样的观点, 他根据《狮子说》序言“兹据多士实验, 暨名史记录, 而首宗亚利格物穷理之师, 探究诸兽情理本谕云”, 认为该书来源较多, 其中最为重要的则是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前384—前322)的学说, 并通过对比《狮子说》与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志》(*Historia Animalium*)和《体相学》(*Physiognomonica*), 找到利类思在“狮子形体”和“狮子性情”章节中的几处描述是参考了亚里士多德关于狮子的叙述。^② 虽然邹振环未对《狮子说》的拉丁文底本展开具体探讨, 但他提出的“诸多来源说”和“亚里士多德首宗说”无疑为底本的追溯提供了新的思路。

首先, 亚里士多德与《狮子说》。亚里士多德作为西方自然史第一人, 其对动植物的介绍一直是后人研究的基础和重要来源。他在《体相学》中对狮子外形进行了描写,^③ 在其《动物志》中, 明确以狮子为标题进行的相关叙述共计有四处, 分别为第六卷第三十一章——“狮”, 叙述狮子的生殖繁衍; 第八卷第五章——“四脚野兽如狼、猿、熊、狮、海豹、河狸、水獭等的食料与习性”; 第二十八章——“动物生活及品种的地区变异, 以蝉、鼠、兔、蚁、蛙、彘、鹿、羊、驴、牛、狼、狐、狮、狗、鹰、鸟、蛇、蜥等为例; 以黑海与红海的螺贝为例。里比亚与印度地区由动物杂交所得的变种”; 第九卷第四十四章——“狮的性情; 灵猫的性情”。^④ 其中与《狮子说》中的“狮子形体”“狮子性情”内容类似的为第六卷第三十一章与第八卷第五章。^⑤ 是故, 利类思的《狮子说》的确反映了亚里士多德关于狮子的若干叙

述, 但“狮不忘恩”“狮体治病”“借狮箴傲”等内容却未在亚氏学说中找到相对应的内容。考虑到亚氏关于狮子的介绍是西方自然界关于狮子知识的重要来源, 他对狮子的描述及研究常常被后来的自然史学者引用并加以拓展, 那么这几部分内容是否会存在于后人在亚氏的基础之上对狮子知识的补充呢?

其次, 大阿尔伯特与《狮子说》。作为13世纪最伟大的神学家和哲学家, 大阿尔伯特致力于对亚里士多德学说的阐释, 他的自然史著作《论动物26卷》即是对亚里士多德动物学的继承与发展。大阿尔伯特不仅对亚氏著作进行评注, 还通过自己的文献搜集和亲身经历丰富了亚氏的动物学体系。而他对狮子的介绍, 主要集中在《论动物26卷》的第22卷《动物天性的逐一叙述》(*Liber Animalium XXII qui Sigillatim est de Naturis Animalium*)第2章《论四足动物》(*Tract. II De Quadrupedibus*)中。其中关于狮子的章节篇幅不长, 开篇介绍了狮子不同种类的外貌特征, 进而描写了狮子的觅食习惯及性格, 值得注意的是, 大阿尔伯特添加了狮身各个器官的药用价值的论述。^⑥ 笔者在对比后发现, 大阿尔伯特对狮子的叙述有部分内容与《狮子说》重叠, 集中在“狮子形体”“狮子性情”及“狮体治病”等章节, 但就文本而言, 其行文顺序与文字描写无法与《狮子说》的内容一一对应。如《论动物26卷》在言及狮子外貌和性情时, 是穿插进行的, 不像《狮子说》将这两部分分别叙述。另外, 《论动物26卷》中将狮子分为三类, 一类项颈有短毛, 较软弱, 一类比豹子更为细瘦, 易胆怯, 一类身长且强壮,^⑦ 但是《狮子说》中将其分为两类: “一身略短, 首项之毛拳卷者, 猛健次之, 一身高, 首项

① Giuliano Bertuccioli, “A Lion in Peking: Ludovico Buglio and the Embassy to China of Bento Pereira de Faria in 1678,” *East and West*, New Series, Vol. 26, 1976, pp. 223-238.

② 邹振环:《康熙朝贡狮与利类思的〈狮子说〉》,《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第1—11页。

③ 邹振环在《康熙朝贡狮与利类思的〈狮子说〉》中主要对比了《狮子说》与亚里士多德动物学说,包括狮子外形和性情描写。

④ 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动物志》,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311、356、392、472页。

⑤ 第六卷第三十一章是介绍狮子的繁殖习性,第八卷第五章是介绍狮子的食性,这与《狮子说》中的“狮子性情”的内容相关。

⑥ Albertus Magnus, *De Animalibus Libri XXVI*, Münster i, W. 1920, pp. 1405-1407.

⑦ Albertus Magnus, *De Animalibus Libri XXVI*, p.1405.

之毛细软悠长者，猛健更强，不惧损伤。”^①

最后，阿尔德罗望迪与《狮子说》。阿尔德罗望迪是16世纪意大利著名的博物学家，他在博洛尼亚创造的植物园和他四处搜集的关于动物学的材料成为他创作的源泉。他生前共出版了四部动物学著作并参与了《论现存无血动物》(*De Reliquis Animalibus Exanguibus Libri Quatuor*, 1606)的一部分。^②而出版于1637年的《论胎生四足动物三卷和论卵生四足动物二卷》(下文简称为《论四足动物》)却不是阿尔德罗望迪亲自撰写，而是由他的学生在其底稿的基础上编撰而成。从该书的名字也可以看出，这部著作主要集中于四足动物的研究，内容是在继承了大量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展开的动物专题研究，包括中世纪的作家及寓言家的素材及大阿尔伯特等人的叙述，而其具体研究框架为追溯动物名字的来源、解剖学上的细节、感官、族属、习性、驯养、声音、繁殖、猎捕、喜恶、传说故事、谚语警句及药用价值等。^③这部书介绍的第一个四足动物便是狮子，章节名为《论狮子》(*De Leone*)。

这一部分对狮子的讨论集中在狮子的外形、性格、药用功效及有关狮子的寓言及格言等。笔者经过文本对比，发现与利类思的《狮子说》中的“狮子形体”“狮子性情”“狮不忘恩”“狮体治病”“借狮箴傲”等部分内容契合，但同时亦有不同。一方面，《狮子说》的行文顺序与《论四足动物》不尽相同，主要体现在“狮体治病”这一章中，利类思描写的顺序为“狮血”“狮油”“狮肉”“狮脑”“狮皮”“狮粪”“狮齿”“狮心”“狮胆”，而《论四足动物》中的顺序为“狮脑”“狮齿”“狮心”“狮胆”“狮油”“狮肉”“狮血”“狮皮”“狮粪”。^④另一方面，《狮子说》中的内容要比《论四足动物》中的《论狮子》更为翔实，如

利类思在述及“狮子不伤兵士”和“狮子与晏多”这两个故事时，不仅十分生动丰富，更有诸多细节描写，比如说“骑骗马者，鞭策不前，骑不骗者驰走，追赶狮子”或者“狮即忻跃，待他如友，常授肉食，晏多没晒熟始食，如此者，同狮穴住三年”等，但在《论狮子》中只是粗略地介绍了故事的梗概，并未展开具体情节的叙述。

综上，亚里士多德作为自然史的“首宗”，他从动物学角度对狮子的描述成为后来动植物学著作的源头，亦是利类思《狮子说》内容的源头，但从文本层面上看，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志》、大阿尔伯特的《论动物26卷》、阿尔德罗望迪的《论四足动物》均不是利类思《狮子说》的拉丁文底本。鉴于阿尔德罗望迪在编著其动物学著作时，时常借鉴其同时代的动植物专家康拉德·格斯纳(*Conrad Gessner*, 1516—1565)的研究成果，^⑤那么格斯纳的著作是否与《狮子说》的底本有关？

三、《狮子说》与格斯纳的《动物史》

格斯纳1516年3月26日出生于瑞士苏黎世(Zurich)，小时候与一位伯父共同生活，伯父以收集草药为生，这使得他熟谙各种植物及其医药价值，也打下了之后从事自然史研究的基础。格斯纳的代表作《动物史》(*Historia Animalium*)汇总了大部分古典寓言及生理学家的叙述并提到了同时代的一些学者的发现，不仅进行了增补和创新，更首次系统阐述了动物在医药和营养学方面的用处。虽然里面也有一些迷信的观点，但瑕不掩瑜，其巨大的学术价值和精美的图片使得该书一时之间风靡欧洲。《动物史》共计五卷，前四卷于1551年至1558年间在苏黎世出版，第五卷是关于蛇类的，出版于1587年。该书的风格类似于老普林尼(*Gaius Plinius Secundus*, 23—79)

① 《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丛刊》(第一辑)，第35册，第159—160页。

② 这四部著作作为 *Ornithologiae hoc est de avibus historiae libri XII* (1599), *Ornithologiae tomus alter cum indice copiosissimo* (1600), *De animalibus insectis libri septem, cum singulorum iconibus ad viuum expressis* (1602), *Ornithologiae tomus tertius, ac postremus* (1603)。

③ Giuseppe Montalenti, *Aldrovandi Ulisse in Dizionario Biografico degli Italiani*, Vol. 2, Roma: Istituto dell'enciclopedia Treccani, 1960, p. 120.

④ Ulyssis Aldrovandi, *De Quadrupedis Digitatis Viviparis Libri Tres et de Quadrupedis Digitatis Oviparis Libri Duo*. Apud Nicolaum Tabaldinum, 1635, pp. 57-58.

⑤ Montalenti, *op.cit.*, pp. 118-124.

的《自然史》(*Naturalis Historia*), 并按照动物种类进行体例安排, 第一卷集中讨论四足动物 (*De Quadrupedibus*), 而就在这一卷中, 有一节内容是关于狮子的。在题目 *De Leone* 下面首先是一副狮子像, 随后展开正文。笔者阅读文本后, 发现其行文顺序与《狮子说》的内容安排大体一致, 但其描写要比利类思的《狮子说》更为具体, 期间多穿插援引亚里士多德、老普林尼、埃里亚努斯 (Aelianus, 175—235) 等人的研究成果。而利

类思《狮子说》的内容除了最后的“解惑”在这本《动物史》中找不到对应的原文以外, 其他章节以及字句均可以从这本书中找到相应出处。但利类思非全文翻译, 而是节选了其中的个别段落并将其从拉丁文译为中文, 且是在忠实拉丁语原文的基础之上进行了意译。下面, 笔者将对利类思《狮子说》中的部分内容与格斯纳《动物史》中的狮子章节进行对勘整理, 同时辅以拉丁文的中文翻译作为参考:

利类思的《狮子说》 ^①	格斯纳的《动物史》(<i>Historia Animalium</i>) ^②	
	拉丁原文	中译文
狮头最硬, 面稍圆, 额方, 中凹, 巨眉, 而眶略深, 眼大, 不圆不长, 眸精蓝, 其色火耀明细。(节选: 狮子形体)	Leo capite validissimo est... faciem leoni rotundam tribuit... Frons ei quadrata in medio magis cava, eminente supercilia... Oculos habet charpos, concauos, non admodum rotundos, nec nimium oblongos... Leonum pupilae praefulgent & dilucidissimum continent humorem, ita ut videantur ignita. (p. 573)	狮子有最强壮的头颅……狮子的脸是圆的, 额头是方的, 中部有一个大的凹陷, 它的眉毛显眼, 眼睛大且内陷, 没有那么圆, 也不是很长……狮子的瞳孔很明亮, 清澈见底, 看着它就像看见火一样。
(狮子) 遇男女及小孩, 先咬男, 后咬女, 非甚饥, 不害小孩, 或咬抓人, 皆流黑血, 被伤者, 极难痊愈, 或射箭不中其体者, 惟向前吓倒之而不杀伤。(节选: 狮子性情)	Ubi saevit, in viros priusquam in feminas fremit, in infantes non nisi magna fame... si quis lapidem aut telum leoni immiserit, & aberraverit, ita ut vel nihil laedat, vel parum, leonem irruere in illum solere & minari (terrere) non tamen interficere. (p. 582)	当(狮子)生气的时候, 先咬男人, 后咬女人, 除非特别饥饿, 否则不会伤婴孩……如果有人向狮子掷石头或箭且没掷中, 类似这种没有冒犯或仅是轻微冒犯的情况下, 狮子会前扑吓投掷者, 但不会咬杀他。
史记有一伙兵士, 身穿铁甲骑马, 欲观狮子, 偶遇三狮, 骑驽马者, 鞭策不前, 骑不驽者驰走, 追赶狮子, 内有一兵士, 放箭射之, 不中, 两狮已去, 惟射不中之狮不走, 马驰将近狮, 复用标枪标刺之, 又不中, 枪仅在狮首飞过, 此兵士即坠马, 滚于地, 狮子扑将过来, 止抓其盔甲, 而不伤其人, 后乃去, 盖狮子之情也。(节选: 狮子性情)	Addit etiam historiam militis... Exiuerat ille cum socijs indextrarijs (equis) ad contemplandum leonem. Dextrarij enim non castrati & fortes ea sunt audacia ut ultro in leones pugnandi gratia ferantur... castrati vero adeo timent ut nec calcaribus nec flagris adigi possint ut propius accedant. Equitantes igitur illi invenerunt tres leones pariter, quorum uni quidam ex eis sagittam immissurus aberravit, sagitta prope caput illius traiecit... Tum miles idem, qui sagittam prius emiserat, in equo ad eum festinavit antequam alijs duobus leonibus coniungeretur, & lancea confodere conatus est. Sed iterum vano ictu percussit terram, tangens aliquantulum fine vulnere caput leonis, & simul de equo ad terram delapsus est. Leo autem accurrens, militis caput in galea compressit laesitq; sed non vulneravit neque occidit eum, & mox alios leones secutus est. Hic igitur est mos leonis. (p. 582)	另有一则士兵的故事……他和他的同伴骑马去看狮子。骑着未被阉割战马的士兵身姿矫健, 与狮子展开争斗。已被阉割的战马则十分胆怯, 无论如何鞭打, 都不向前。骑兵们发现有三只狮子, 其中一只未被箭射中的狮子在原地徘徊, 箭从它的头部飞过去。之前射箭的那个士兵便骑着马靠近这只狮子, 趁着其他两只狮子还没有围集过来, 他再次挥起标枪。但又一次投空, 落在了地上, 标枪仅从狮子头部飞过, 将它轻微擦伤。这个士兵也从马上摔到地上。狮子扑上来, 抓打他的头盔, 但并未伤害士兵本人, 过了一会儿便去追寻其他的狮子了。这是狮子美德的体现。

① 《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丛刊》(第一辑), 第35册, 第159—175页。

② Conrad Gessner, *Medici Tigurini Historiae animalium Lib. I. de quadrupedibus uiuiparis*. Tiguri: Apud Christ. Froschouerum, 1551, pp. 572-605.

(续表)

利类思的《狮子说》	格斯纳的《动物史》(<i>Historia Animalium</i>)	
	拉丁原文	中译文
史载有一仆, 名晏多者, 获重罪, 逃于利未亚洲, 免死, 遁入深山, 不觉误入狮洞, 遇狮归洞, 吓惊倒地, 狮受刚茨伤足, 痛疼之甚, 见晏多倒地, 近前摇尾, 喜欢, 提足示伤, 欲其拔除, 晏多昏骇, 无奈, 以手轻拔其刚茨, 狮即忻跃, 待他如友, 常授肉食, 晏多没晒熟始食, 如此者, 同狮穴住三年, 后厌其处, 遂出洞穴, 被获送官, 监禁, 定其死刑。(节选: 狮不忘恩)	Servus, cui nomen Androcles erat, aufugisset, quia facinus quodpiam nefarium admisisset, & vero in Africam venisset: relictis urbibus in desertissimam processit regionam... ibique cum ardore solis torreretur, speluncam subiens, ab aestu requiescebat; haec autem spelunca leonis erat cubile. Postea autem quam ex venatu leo(gemitus edens & murmura dolorem cruciatumq; vulneris commiserantia) summo cum dolore quo laborabat ex pede transfixo stirpe a summo praeacuta revertisset, atq; in iuvenem qui intra specum abdebatur, incidisset, ipsum leniter aspexit, ac blandiri coepit, pedemq; porrexit, & quoad poterat sibi stirpem extrahi rogabat. Ille primo, etsi mors illi necessaria erat, ab eo pertimuit, deinde postquam mansuetam vidisset beluam, & pedis morbum cognovisset, tum id quod pedem vexaret, evellit, tum vero dolore liberavit... qua curatione leo delectatus, illum hospitaliter & amice tractando, & quae venaretur... cum illo communicando, praemium salutis persolvit... ille vero assis(sole meridiano torrens cum ignis copiam non habere) vescebat... vivendi rationem utebatur. Itaque totum triennium ibi Androcles aetatem duxit. Cum eius modi habitationis illum taederet, iamq; solitudinibus eius animus expleretur, a leone discendens(leone venatum profecto reliquit specum: & viam ferme tridui per mensus, a militibus apprehensus est) ... Romam ad dominum ferunt. Hunc dominus tum de his quae admisisset facinoribus reum facit; ita factum est, ut is sic capite damnaretur, ut distrahendus bestiis daretur. (p. 583)	从前, 有一个叫 Androcles 的奴隶, 因为犯了重罪, 逃到了非洲, 离开了城市来到一个蛮荒之地。在那里他经受了太阳的暴晒, 最后他找到一处洞穴用来歇脚。而此洞穴为狮子的兽穴。稍后, 狮子捕猎归来 (因为受伤, 它发出痛苦的令人同情的嚎叫), 他的剧痛来自于深扎它足底的刺, 它需要帮助把刺拔出来。当它回到洞穴时, 发现那个藏匿在这里的人, 它善意地盯着他, 并开始讨好他, 展示自己受伤的脚给他看, 祈祷他可以拔出那根刺。起初这个人非常害怕这只狮子, 他除了死亡没有别的想法, 随后, 他看到这只野兽如此温顺, 并注意到它脚上的伤, 于是拔掉它脚上的刺, 让它免受伤痛……他的帮助让狮子非常高兴, 它友好地对待 Androcles, 就像朋友一样。狮子出去打猎, 并与他一起分享猎物, 以此来报答他的恩情。因为没有火, Androcles 就在中午把肉晒熟后吃, 就这样, 他在这里住了三年。当他厌倦这里的生活时, 他开始思考如何离开狮子。在狮子外出打猎时, 他离开了洞穴, 在路上走了大约三天后, 被一伙士兵抓捕起来, 带回罗马他主人那里。Androcles 承认了他犯下的罪行, 于是他被判处死刑, 即被野兽撕成碎片。
狮血涂身, 百兽不敢残害。(节选: 狮体治病)	Sanguis leonis confricatus super cancrum, curat eum, leonis sanguine si quis corpus suum linierit, ab omnibus bestiis erit tutus. (p. 589)	狮血涂在肿块上, 可以消除肿块, 狮血抹于全身, 可以免受所有野兽的侵害。
狮油擦体, 百兽闻之远遁, 传其患处, 能止诸痛, 灌于耳, 亦止耳疼。(节选: 狮体治病)	Adipe leonis perunctus fugat omne animal etiam sepentes... adeps leonis remissus statim inunctus omnem dolorem sedat... leonis adipem remissum auribus instillato, a dolore liberat. (p. 590)	狮油涂擦身体, 可以吓跑所有动物, 包括蛇……狮油涂抹病痛处, 即可减轻疼痛……把狮油灌于耳朵, 可以减轻耳痛。
狮肉食之, 可以昏迷妖怪。(节选: 狮体治病)	Qui carnes leonis decoctas manducant, phantasmata non patient. (p. 589)	吃煮熟的狮肉的人, 不会产生幻觉。
食狮脑其人即疯。(章节: 狮体治病)	Cerebrum leonis esum stupefacit mentem. (p. 590)	吃狮脑可以使人精神错乱。
狮皮做履穿之, 足趾不疼, 作褥子坐之, 无血漏之病。(节选: 狮体治病)	Si quis ex elaborateo leonis aut lupi corio calceos gestet, pes non dolebit, si quis sederit super pellem leonis, recedent ab illo haemorrhoides. (p. 589)	如果有人穿狮皮或狼皮做成的鞋子, 他的脚不会疼痛, 如果有人坐在狮皮上, 就不会有痔疮。
制造膏药, 入狮干粪, 能脱除疤痣。(节选: 狮体治病)	Stercus leonis desiccatum & permixtum unguento, cum quo aliquis unguatur, delet maculas. (p. 590)	把狮粪晒干, 与膏药混合, 一起涂抹, 可以消除斑痣。
狮齿于小孩未生牙前, 及脱牙将生之候, 悬挂胸膊间, 一生牙齿不疼。(节选: 狮体治病)	Si dens leonis caninus collo pueri suspendatur, antequam cadant dentes, & in ortu dentium secondorum, securum reddet a dolore dentium. antequam ei dentes nascantur, securum reddit a dolore dentium dum enascuntur. (p. 590)	如果把狮子的尖牙挂于小孩的脖子上, 在他牙掉未长之时, 会减轻牙痛; 在他生牙之前, 会减轻生牙疼痛。

(续表)

利类思的《狮子说》	格斯纳的《动物史》(<i>Historia Animalium</i>)	
	拉丁原文	中译文
食狮心与别肉伴食，其人一生无疟疾。(节选：狮体治病)	Cor in cibo sumptum quartanis medetur. (p. 590)	将狮心混在食物里一起食用，可以治疗四日热(疟疾)。
食狮胆，立时便死，将胆调水擦眼，眼即光明。(节选：狮体治病)	Leonis fel potantem euestigio interficit... fel auqa addita claritatem oculis inunctis facit. (p. 590)	喝了狮子的胆汁，会立即死亡……将胆汁加上水擦眼，可以让眼睛明亮。
曰由一趾知狮子，意指人作小事美则知其大事忧，如见几句文，便知全文之佳。(节选：借狮箴傲)	Leonem ex unguibus aestimare... est ex una quapia coniectura negorium universum perpendere, ex paucis multa, ex minimis maxima conijcere. (p. 604)	可以从脚趾推断出来狮子，可以从一处美好的小事了解到整件事情的忧虑，见微知著，从小见大。

在对文本进行依次对勘后，根据行文顺序的安排、翻译内容的完整以及字句的拉中对译，可以推测利类思在创作《狮子说》时所依据的拉丁文底本为格斯纳的《动物史》。但利类思在译述时并非全译，而是“略述其概”，对《动物史》中有关狮子的章节进行了择取而译，例如利类思在《狮子说》中提到的用以治病的狮子部位有八处：狮血、狮油、狮肉、狮皮、狮粪、狮齿、狮心、狮胆，格斯纳在《动物史》中介绍狮子在医药方面的作用时，不仅比利类思介绍得详细，部位也更多，如狮肾、狮肝等。《狮子说》中的“借狮箴傲”则是译自于该章节最后的“谚语”(proverbia)部分，而关于狮子的谚语多出于西方寓言和俚语，代表了西方古典文化的精髓，亦是中西方文化之间最具张力所在。但可惜的是，利类思在进行箴言翻译时，多是用中文将西方箴言直接译出，而少了对其背后故事或文化语境的介绍，这使得箴言内涵略显单薄，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也比较突兀，难以在阅读群体中顺畅传播。

四、《狮子说》与耶稣会传统

文艺复兴在欧洲的兴起，使得人们重新认识艺术和知识，在肯定人自身价值的同时，开始重视理性和自然，这同样体现在15、16世纪的动物学家及其著作上。如果说中世纪或之前的动物史侧重的是神话和寓言，那么格斯纳或阿尔德罗望迪则开始在汲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加入了对大自然的观察，将零散化、碎片化的自然描

述整理为系统的百科全书式的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说，格斯纳的《动物史》可以被看作是西方近代动物学的开端。因格斯纳信奉新教，在宗教关系紧张的时期，《动物史》曾被列入天主教禁书名单，但威尼斯(Venice)的一些天主教书商却抵抗了这一禁令，在把该书的一些教义错误清除之后，他的书籍得以重新流通。

利类思作为一名天主教的神职人员，面对教会“禁书”，仍选择对其进行翻译和介绍，再次展现了耶稣会士为了达到传教目的而采取的灵活手段。耶稣会自1540年建立，一直是彼时天主教修会中最为重要的革新派，主张神学教育和人文主义并举，希望通过培养具有人文主义关怀的传教士，来激活天主教的活力。耶稣会士不仅被派往四面八方，来实践“愈显主荣”(Ad Majorem Dei Gloriam)，更是将其传教重点放在青少年和贵族阶层，为了便于传教，修会“可以灵活有效地派遣会士担任各项工作，比如做传教士、中学教师、大学教授和科学家完成教会或政治使命，或作为宫廷告解神父”。^①如前文所述，利类思译述《狮子说》的初衷是为了配合葡萄牙的贡狮活动及赢取康熙帝的“友谊”，而这不仅关涉到葡萄牙与罗马教廷之间的政治活动，亦是耶稣会对其“上层路线”传教策略的坚持和维护。

《狮子说》属于“西学汉籍”范畴之内，是在华耶稣会士推行“以书刊教”的延续。因为彼时在中国出版的书籍需要受到教会内部的审查监督，自1623年耶稣会中国副会省独立后，审查书

^① 彼得·哈特曼著，谷裕译：《耶稣会简史》，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12页。

籍的权力转交到在华传教士手里。而明清鼎革时期，中国耶稣会分为南北两区，所以远东视察员负责颁发书籍的印刷许可，在华传教士群体则负责审查书籍内容，这从书籍扉页的订正者可以看出来。^①但《狮子说》中仅有“极西耶稣会士利类思述”，未见到其他耶稣会士参与订正及获得准印的痕迹，这也许是因为在华传教士人力匮乏，抑或是他们对非宗教书籍不重视，鲜有传教士对关于天文、地理、动物等的西学书籍进行集体审定，

自然也就没有教会的出版许可。与宗教书籍相比，这类著作的角色更像是传教士的“庶出”，被视为满足中国文士的好奇心之作，虽然其内容常被附以教义，带有宗教神学色彩，但由于少了教会的严苛管制，这类书籍反而充分表现出传教士的个人特质，个人在西学方面的专长得以发挥出来。因此，《狮子说》这类著作在一定意义上是耶稣会传统的产物，同时也是西方人文主义的主要载体，从不同角度推动了早期中西文化的交流与互动。

(胡文婷：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图书寮汉籍丛考》简介

由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汉籍研究会编纂的《图书寮汉籍丛考》，于2018年2月由日本汲古书院出版。全书分为论说编、讲演录、图录编三部分。论说编收录小森正明《图书寮文库的沿革与汉籍》等九篇文章，涉及图书寮藏汉籍的历史、总体面貌，以及其中较为重要的藏品，如圣语藏旧藏、旧钞本《春秋经传集解》与《古文孝经》、北宋本《通典》、南宋本《东都事略》《论衡》《严氏济生方》等。讲演录收录陈正宏《线装书与东亚汉籍保护史》等报告四篇，围绕中、日、韩及北美等地的汉籍研究与数字化展开。图录编收录奈良朝写经22部，汉籍旧钞本15部，宋版书70部。每书皆有书影与较为详尽的提要。

图书寮始创于日本大宝元年(701)，隶属中务省，专门从事于图书的搜集、抄写与保存。二战之后，改称书陵部，移交宫内厅。其收藏汉籍极为丰富，日本学者神田喜一郎曾编有《图书寮汉籍善本书目》，著录其善本精华七百多部。近年来，原图书寮旧藏逐渐披露，如收录66部宋元旧刻的《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选刊》已在国内出版，日本也于2016年建设并开放了“宫内厅书陵部收藏汉籍集览”数据库，公布了140余部汉籍全文影像。本书即在数据库的基础上增补而成，为日本学界研究日藏汉籍的最新成果之一。

^① 参见伍玉西：《明清之际中国天主教会的出版管理——以耶稣会为中心》，《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第54—57页。

Select Abstracts

A Study of Cultural Symbiosis of the Maritime Silk Road: “The Trilingual Stele of Zheng He in Ceylon” as a Case

Wan Ming

Abstract: From a new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symbiosis, this article tries to take “The Trilingual Stele of Zheng He in Ceylon” as a case, and to go beyond the framework of previous studies on the static and isolated history of Sino-foreign relations or regional history, to discuss and study the phenomenon of cultural symbiosis of the Maritime Silk Road. In 1911, a famous stele was found in the port city of Galle in south Sri Lanka. This stele was erected at the monastery of Ceylon by the famous Chinese navigator Zheng He during his second voyage to the Indian Ocean in 1409. It recorded in Chinese, Tamil and Persian the respect for three navigation protection gods Sakyamuni, Vishnu and Allah, reflecting the historical fact that the Indian Ocean seafarers had common navigation protection gods, which was the crystallization of the cultural exchanges and integ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Indian Ocean regions, and also the true embodiment of the cultural symbiosis of the maritime silk road. Following the accounts of *Yingya Shenglan* by Ma Huan, this paper aims to trace the humanistic background of the stele, point out that Zheng He’s seven voyages to Indian Oceans opened up new space for dialogue and development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civilizations. It fully demonstrated tha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oreign relations in the Ming dynasty was inclusive and open. China’s maritime civilization absorbed the rational elements of multiple maritime civilizations, and became part of its own maritime civilization through exchange, absorption and integration.

Key words: the maritime silk road, cultural symbiosis, “The Trilingual Stele of Zheng He in Ceylon”, Zheng He

Historical Narration of the Silk Road and Sino-Iranian Cultural Exchanges

Li Wei & Ma Yujie

Abstract: The greatest contribution of the Silk Road to world civilization is that it enhances the communication among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ethnic groups and promotes two-way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When their relationships are good,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different civilizations can be unhindered through official and civil channels; once the political relations are tense, the exchanges between civilizations are still working, but the source of civilization can be entered or transmitted through other channels. There are good examples of these situations in the history of Sino-Iranian exchanges, which reflect the acculturation of China and Persia. On the one hand, the Persians would inevitably be influenced by Chinese culture once they came to China and immersed in such a rich and profound cultural tradition, and gradually broke away from their original cultural constraints, sharing the same mentality with Chinese; on the other hand, these Persians in China tried to keep their own culture for a long time and devoted themselves to introducing Persian culture into China. Such exchanges between the two civilizations are an important basis and condition for the localization of the Islamic civilization in China.

Key words: the Silk Road, Sino-Iranian exchanges

New Study on the Original Latin Version of Ludovico Buglio’s *Shizi Shuo*

Hu Wenting

Abstract: Ludovico Buglio, the Italian Jesuit who came to China in the 17th century, served as a vassal for the Qing court for a long time. He translated a book on zoology, titled *Shizi Shuo*, which was the first one on zoology introduced into China from the West. Although some domestic and foreign scholars have carried out relevant researches, there are still controversies on its original Latin version. Therefore, based on the Latin text, this article further explores the text source of *Shizhi Shuo* through literary documents and the specific Latin journal, in order to

supplement the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western zoology introduced into China during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Key words: *Shizi Shuo*, western zoology, Ludovico Buglio, original Latin version

On W. A. P. Martin's Comments on China's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Wang Jian

Abstract: W. A. P. Martin's comments on the Chines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showed a rational attitude to China, which were contrary to other western missionaries' attitude of his time. This paper analyses W. A. P. Martin's comments in the contex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dern China and the West based on the power in late Qing dynasty, and takes his multiple identities as clues to explore a potential motive for his attitude. Taking China's education system as an example, W. A. P. Martin advocates the civilized elements contained in it, in order to reduce the western society's barbaric prejudice against China, and finally posits China as a semi-civilized country stipulated by western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19th century, so as to safeguard the colonial and missionary interests of the West in China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international law.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in terms of historical objective influence, his comments o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modern civil service system in both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Key words: W. A. P. Martin, missionary sinologist, semi-civilized, China's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A Study on Kano Naoki and Chinese Popular Literature in Japan

Zhang Zhen

Abstract: The formation of the Kyoto school was mostly centered on the researchers of a certain field in the early days of Kyoto Imperial University and with their students as the main members. As the founder of the Kyoto school of Chinese popular literature research, Kano Naoki was the first to establish the disciplinary system of Chinese popular literature at Kyoto Imperial University. He introduced the modern method of textual research into the study of Chinese popular literature, and actively contacted and communicated with the European sinologists. Meanwhile, it is no accident that the researches on Chinese popular literature of Kano Naoki and Shionoya Akira are both related and different. Besides their own unique academic experience,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two imperial universities in Tokyo and Kyoto at that time was also one of the important reasons for their association and distinction of academic studies.

Key words: Kano Naoki, Chinese popular literature, the Kyoto school

The Non-institutional Chinese Stud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Early 20th Century: A Case Study of Paul Carus

Xu Xiaomin

Abstract: Paul Carus was an accomplished American editor, philosopher, translator and orientalist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and early 20th century. As the editor-in-chief of *Open Court*, he devoted himself to the dialogue between philosophy and science as well as the comparative studies of eastern and western thought, and published a large number of works on Chinese studies, which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He was a prolific writer, and did an in-depth study of Chinese philosophy. As an independent scholar, he was not attached to the church or any official institutions, which enabled him to keep independent thoughts. As an influential and active scholar at the interval of James Legge's age and the growth of American Chinese studies in the mid-20th century, his achievements are too important to be ignored. By analyzing Carus's works on Chinese philosophical studies, this paper aims to draw scholars' attentions to the popular power of American sinological studies and provide references for further study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studies and the